

时空结构中的资源、权力与实践

——评吉登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
权力、财产与国家》

陈建伟

初版于1981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第一卷）：权力、财产与国家》一书是吉登斯“社会理论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另外两部分分别是1985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第二卷）：民族国家与暴力》和1994年出版的《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①。文章在开头提及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意在强调应当从吉登斯某一时期的整体学术规划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这本书，并且提请读者们关注吉登斯在这本书之前所做的理论工作，以及“社会理论三部曲”在吉登斯的整个学术思想中的历史定位。

实际上，一方面，在写作三部曲之前，吉登斯已经基本完成了其“结构化理论”的建构工作，这些工作主要体现在1976年出版的《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对解释社会学的实证批判》和1979年出版的《社会理论核心问题：社会分析中的行动、结构与矛盾》这两本书之中。正如吉登斯反复强调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一书是他贯彻自己的“结构化理论”的典型作品。而用卡林尼科斯略带挖苦的话来说，吉登斯在这里“兑现了他的概念支票，把社会理论核心问题中的类型学投入应用，为的是提供一个不同于马克思的关于历史发展的解释”（Callinicos, 1995）。另一方面，在更早之前，吉登斯已在1971年和1973年分别出版了《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和《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在第一本书中，吉登斯在论及马克思的社会学理论时，强调了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关系与阶级结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等三个方面。而由于第二本书，吉登斯被人们贴上了“新韦伯主义”阶级理论家的标签。可以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是吉登斯对其古典理论关注点的自然延续。在这本书中所做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在为其宏观理论添

^① 国内这两卷是分别出版的，本文主要讨论“第一卷”，因此，凡在下文提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时，指的都是“第一卷”。

加微观基础。出于这几方面原因，笔者认为，要想全面地或者起码是准确地理解吉登斯的“社会理论三部曲”，需要对这些前期的著作加以注意。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这本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1）理论部分，即第一章和第二章，介绍了结构化理论的基本概念和观点，形成了“本书整个其余部分之理论立场”；（2）历史理论，包括第三章到第七章，分析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整合和社会变迁问题；以及（3）国家理论，即第八章到第十章，主要是纠正和补充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很少得到讨论的”民族主义、国家以及社会主义这三个议题。按作者写作的习惯，吉登斯这种先理论后展开的结构安排是合理的。但如果是要做进一步学术评论，笔者认为可以采取“逆水行舟”的方式，先阅读作为理论之贯彻的第三章至第十章，再阅读作为理论立场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原因在于，后边这些章节不仅对前两章的理论进行充分的呈现，同时也因其细部的展开更为突显前两章的一些理论难点，有助于深入理解其结构化理论的核心。因此本文以下内容将首先介绍《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后两个部分尤其是第二部分（历史理论），然后与前两章对照讨论，以阐明吉登斯在“晚期现代性批判理论”上的创新之处。

一、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张力

吉登斯是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版本开始讨论的。这两种版本一个出现在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960：11 - 640）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972：7 - 11）之中，另一个则出现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一节，即《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下文简称《形式》）（马克思，1980：470 - 498）之中。吉登斯认为，第一个版本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解释”，即一方面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来分析人类社会的变迁轨迹（“化约论”），另一方面则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几个不同“阶段”线性演进的过程（“进化论”）。也就是说，每一种社会形式都内在地包含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新的社会形式则意味着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案。与此有所不同，《形式》所代表的第二个版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把东方社会或“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游离于一般社会进化模式之外的一种社会形式，并且突出了资本主义存在大量自由劳动力这一区别于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除此之外，马克思在分析中没有突出“生产”作为驱动原则和变迁杠杆在

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且还似乎把生态因素（人口的稀疏和集中）与战争因素放在社会动力学的首要地位。吉登斯认为，第一种版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重大缺陷，应该被抛弃；相反地，第二种版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则包含诸多可取之处。正如他在本书的《导论》中所说的，“马克思在《形式》中所提出的观点对于本书的分析至关重要，因为本书的目标就是要贯彻他在那里提出的观点”（吉登斯，2010：2）。

具体来说，吉登斯对《形式》中体现的第二种版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做了实质性的修正。这种修正的根本在于，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与前资本主义社会截然不同的一种社会形式，认为它“标志着一系列与此前历史的根本断裂”。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特征、整合原则和动力机制是截然不同的。在这里，吉登斯提出了两组关键概念：（1）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以及（2）阶级分化社会和阶级社会。权威性资源即人们对人类所创造的社会本身所具有的控制能力，配置性资源则指人们对客观物质世界所拥有的控制能力。换用更简单但稍微有些失真的术语来说，权威性资源即对人的支配能力，配置性资源则是对物的支配能力（Callinicos, 1985; Sewell, 1992）。吉登斯认为，这两种资源分别对应着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是在东方社会还是在欧洲，权威性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构成了社会组织的首要结构性原则，财产所有权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配置性资源的分配”没有成为权力的最重要基础。由于阶级的划分是与配置性资源（或者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生产资料和私有财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前资本主义只是一种“阶级分化社会”（class-divided society）。也就是说，在这些社会中“存在着阶级，但阶级分析并不构成识别这一社会组织的基本结构性原则的基础”（吉登斯，2010：110）。相反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配置性资源取代权威性资源成为了社会组织的首要结构性原则，并且与此相应地，资本主义也就成为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阶级社会”。正如吉登斯所强调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阶级社会，也就意味着一方面经济被赋予了首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剥削关系和阶级支配进入了劳动过程的核心。总之，在吉登斯看来，建立在“配置性资源居于社会组织首要地位的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并不适合用来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但尽管如此，“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分析的重要核心”却仍然是可以接受的（吉登斯，2010：160）。历史唯物主义中所主张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分析作为一种社会类型的资本主义仍然“具有特别的参考价值”（吉登斯，2010：90）。

在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差异时，吉登斯集中关注了“社会/系统整合”问题。遵循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的观点，吉登斯在结构化理论中区分了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吉登斯，1998：233 - 240）。简单来讲，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指的是社会中的个人或者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关联，系统整合（system integration）指的则是社会或社会系统的各个部分（即社会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资本主义社会中各个阶级集团相互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属于社会整合问题，而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则属于系统整合问题（Marshall，1998）。

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系统整合”问题是通过求助于阶级概念来解决的。具体来说，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社会中，一方面，“总是存在着根据生产工具所有制或者私有财产而分化成的两大基本阶级”，阶级关系是一种剥削关系，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对立，并且因此导致各种冲突和斗争；另一方面，由此带来的是，国家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社会的政治领域（君主或国家）和经济领域（地主或资本主义企业）存在着天然的渗透关系。

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中，尤其是在第四章和第七章中，吉登斯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吉登斯指出，在群落社会、定居农业共同体以及城邦国家中，以传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封建社会和帝国社会中，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逐渐分离，形成了国家和社会分离、经济和政治分离的“双重”组织。一方面，在社会整合上，“持续存在的地方共同体及其血缘和传统”牢牢控制着广大的农业人口；另一方面，在系统整合上，帝国社会主要通过使用以军事权力为基础的强制性措施，以及统治精英内部的权威合法化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来维持和巩固政治统治，“国家可以组织和榨取剩余产品，但却处于生产过程本身的最外围”（吉登斯，2010：127）。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机制出现了显著的分化”（吉登斯，2010：170）。一方面，阶级关系渗透到了劳动过程之中，资本主义劳动契约使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产生了持久的相互依赖关系。另一方面，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解放的力量，它把对暴力制裁的控制从阶级剥削关系中驱除了出去，并实现了对暴力工具的垄断（吉登斯，2010：185）。与此同时，与在帝国时期的国家“从治下人口那里强行榨取税收、其他贡赋和劳役的权力并没有深入平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吉登斯，2010：104）不同，随着监控活动的深入，资本主义“国家”更具有侵入性并且更加全面地控制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二、结构化理论：权力与时空关系

如果忽略吉登斯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介绍的结构化理论，仍然可以理解他后面
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然而这种理解最多只是一种“否认”意义上的理
解。也就是说，我们将只是知道吉登斯如何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破绽，如何从人类
学、考古学和地理学的最新发展中寻找证据，以及如何在有限的程度上对马克思的
理论进行修正，但却会失去《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中大部分属于吉登斯自
己的东西。因此，要想完整、准确地理解吉登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还
必须“回过头去”找回他的结构化理论。

结构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和基本假设是所谓的“结构二重性”概念。不过在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一书中，权力（支配结构）和时间性（时空关系）问
题占据着更加突出的位置。吉登斯写道，他“提出结构化理论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于
使时间性成为社会理论的核心”（吉登斯，2010：28），与此同时，“权力必须作为
社会体系架构的各种要素中的一种得到分析”，“对于权力的关注是本书一以贯之的
线索”（吉登斯，2010：3-4）。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一书中，对时空关
系的分析是与对“权力/支配关系”的分析结合在一起的。吉登斯认为，所有的社
会行动都由处于时空当中的社会实践所组成，而权力作为互动的内在要素则“例行
性地卷入社会实践的具体化”（吉登斯，2010：49）。

一方面，围绕着时空关系问题，吉登斯提出了以下几个重要的概念：“在场可得
性”（presence-availability，或者在场/缺场），“时空伸延”（time-space distancing），
以及“时空边缘”（time-space edges）等。吉登斯没有详细解释在场可得性，不过
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看作人们在互动时直接接触的程度。在无法直接接触的情况，
即在所谓“缺场”的情况下，人们通过记忆、传统、书写等与其他时间或者其他空
间中的人（即时间上遥远的人和空间上远隔的人）产生互动（Callinicos，1995）。
关于时空伸延概念，吉登斯指的是“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长短跨度”（吉登
斯，2010：9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概念是吉登斯的“凝集”（bind）概念的另
一种说法，也就是说，时空伸延就是社会系统“凝集时间和空间”的深度和广度。最
后，时空边缘概念与前两个概念有所不同，它主要用来取代进化论解释中的“阶段”
（stages）概念，指的是多个社会系统或社会类型的共存和交流（吉登斯，2010：83）。

另一方面，在分析权力/支配关系时，吉登斯建立了一个以资源和“资源的不对称分配”为基础的权力概念。正如本文前面指出的，吉登斯在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之间做出了区分，这两种资源对应着支配的两个方面，即行动者对他人的控制和对物质世界的控制，而权力指的就是在这些控制过程中产生的自主和依赖关系。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吉登斯用“人类行动的转换能力”取代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来作为人类行动的基础，并且把转换能力作为权力和支配的核心。由于转换能力指的是“可以换一种方式行事”的能力，因此这就意味着，在不对称的权力控制关系中，行动者（尤其是权力关系中的被支配者）总是有机会采取反抗行动，而这正是（权力）控制辩证法的主要含义。

吉登斯的理论分析的关键就在于把“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与支配性结构联系在一起”（吉登斯，2010：4）。并且更进一步地，由于“在所有类型的社会，时空伸延的媒介同时也就是社会整合的手段”（吉登斯，2010：161），所以当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吉登斯所说的联系之后，也就可以把“结构化理论”与本文第一节中讨论的两种社会类型的划分（即阶级分化社会 VS 阶级社会，或者前资本主义社会 VS 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与之对应的“社会/系统整合”问题结合起来了。

让我们还是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这本书中，从不同社会类型的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首先，吉登斯认为，在最原始的群落社会中，存在着高度的在场可得性。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社会里，人际互动基本上都是采取直接的、面对面的形式展开的。与此相应地，群落社会的时空伸延水平很低，社会在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跨度非常短。所有这些特征也就决定了本文在第一节中所指出的：在群落社会中，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很大程度上”联系在一起，或者甚至成为同一过程。

接着，到了阶级分化社会之后，在场和缺场开始分化，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开始以“储存”的方式产生作用。举例来说，在群落社会中，命令只能通过面对面的口授来传达，但在“更发达的”（虽然吉登斯反对用这种明显带有进化论色彩的词）阶级分化社会中，由于“书写”的出现，那些“与管理事务相关的信息：‘符木、象征物、工资清单、配给清单、供应清单、月度账本’”^①就被记录下来，对其他时间和其他空间中的（即缺场的）行动者产生影响，并且“产生了口承文化不能获得的权力”（吉登斯，2010：96）。而储存能力所带来的权力的这种“远距

^① “符木”，原文“tallies”，指古代用以刻画记载欠款或付款数目的木签；“象征物”，原文“tokens”，含有标志信物和代用货币的意思。——笔者注

离”作用方式，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的时空伸延水平。在分析阶级分化社会时，吉登斯还特别提到了城市的作用。吉登斯接受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观点，认为城市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储存器”，也就是所谓的“权力集装箱”（power container）或者“权力的熔炉”（crucible of power）。在这里，城市将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权力“封装”起来，与它所控制的农村形成一种“中心/边缘关系”。所有这些，无论是书写的应用还是城市的产生，都使得“在场”不再成为不可或缺的互动情境，并且更重要的是，使得社会整合（以村庄/地方共同体和血缘纽带等来维持）和系统整合（以城市和农村的中心/边缘关系来实现）开始分化。

最后，在阶级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中，时空伸延和权力结构产生了性质上完全不同以往的变化。这种变化以三种商品化为“起点”，即劳动商品化、时间商品化、以及空间商品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成为一种商品，剥削关系进入了劳动过程的核心。这一变化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导致了劳动纪律和劳动管理的出现，并且剩余生产的剥削机制开始从直接占有剩余产品转变为“建立在对劳动过程的直接控制之上”（吉登斯，2010：138）。更进一步地，“货币资本的普遍化、劳动力商品化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转化使时空媒介得以广泛延展，并且摧毁了地方性生产共同体的隔离和自治性质”（吉登斯，2010：123）。同样地，时间和空间的商品化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的生产”（production of everyday life）。时间的商品化是与劳动商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量化时间是劳动力商品化的核心。不过这里更重要的似乎是由工厂制度的建立所导致的“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意味着“具有明显时间封装的工作领域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之间的规范性联系不再具有保证”（吉登斯，2010：157）。土地的商品化则使城市成为“人造空间”（created space），在失去了阶级分化社会中城市所承载的共同在场和传统的同时，也使得城市（由于城市/乡村分化）所起的“权力的熔炉”的作用让位给了民族国家。所有这些都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社会）中，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离，并且“大范围日常社会生活的时空组织与参与者的道德和理性内容越来越剥离开来”（吉登斯，2010：159）。

通过以上挂一漏万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一书所做的介绍可以看出，吉登斯用代表人类行动的“转换/媒介关系”取代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并且建立了“时空关系—支配—整合”的分析框架，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主张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以及阶级斗争在社会秩序（整合）和社会

发展（变迁）上的作用。虽然吉登斯反复地提及马克思的某些分析“不可或缺”（吉登斯，2010：7），并且承认“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企业中持久而普遍的特征，阶级冲突则扮演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转型的主要媒介”（吉登斯，2010：227），但是，当他把时空关系等概念引入其理论框架，并且自称要“把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与社会时空构成的主题联系在一起”（吉登斯，2010：7）的时候，也就从根本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三、余 论

正如卡林尼科斯指出的，吉登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这本书中兑现了他的“概念支票”。很明显，这本书是吉登斯众多著作中比较具有实质内容，甚至带有一定程度的经验色彩的一部。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是在用经验事实来论证概念的相关性（relevance）和有用性（usefulness），而不是（如吉登斯自己所声称的那样）用概念和理论来指导经验研究。

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欧美学界出现了大量杰出的历史社会学著作，比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几乎同时出版的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Skocpol, 1979），在这之后出版的亨特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Hunt, 1984），以及更晚的拉克曼的《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近代早期欧洲的精英斗争与经济转型》（Lachmann, 1999）。与吉登斯的著作不同，这些著作都是用一组概念来解释历史上的经验现象，具体来说是革命与社会转型问题。当然，也可以说斯考切波创立了一种“找回国家”范式，亨特的著作开启了“新文化史”注重文化传统和象征形式（权力的诗学）的作用的理论方向，而拉克曼的著作则提供了“一种不同于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精英视角”。但是，为了不让学术上任何一种问题最后都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沼，本文认为坚持“用经验研究证实理论 VS 用理论指导经验研究”这样的区分是有意义的。如果这一主张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将稍微改变在本文开头时所提出的所谓“意见”，即在阅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一书时，关键不在于“转回头去”回溯它的理论基础，而是应该“转过头去”寻找一些经验研究，通过阅读经验事实来验证吉登斯的理论观点是否有效，甚至更重要的是，思考吉登斯的理论观点对于指导实证研究的意义，思

考他的理论观点和概念图式与其他社会学家的概念图式（比如沃勒斯坦的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帝国和小型系统）之间在解释力上的优势或者劣势。

参考文献：

- 吉登斯，安东尼，1998，《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北京：三联书店。
- ，2003，《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田佑中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0，《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郭忠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2013，《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马克思、恩格斯，19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 Callinicos, Alex 1985, "Anthony Giddens: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Theory and Society* 14 (2).
- Giddens, Anthony 1973,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London: 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
-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Action,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1,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ower, property and the state (Vol. 1)*.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unt, Lynn 1984,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achmann, Richard 1999, *Capitalists in Spite of Themselves: Elite conflict and european transi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rshall, Gordon 1998, "Social Integration and System Integration." in *A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kocpol, Therda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ewell, William H. 1992, "A Theory of Structure: Duality, agency, and transforma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1).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

责任编辑：吴莹 杨清媚